



# 宪政就是“拔钉子”

宪法和宪政这段时间成了热词,这是好事。我国今年是82宪法出台30周年。历史推进到今天,宪法不是问题,问题是宪政。如果只有宪法而没有对宪法的落实,宪政就是一个泡影。现代政治文明中的宪法,无不是给权力套上一个紧箍咒。如果权力可以比喻为孙悟空,宪法就是孙悟空无论怎样跳都跳不出其手心的如来佛。

如来佛能够成功控制孙悟空的政治状态,即为宪政。如来佛不能控制孙悟空,或孙悟空根本就不理会如来佛,这样的政治不是宪政而是宪政的对立面专制。当年梁启超鼓吹清末政治改革,就是改专制为宪政,由此造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末立宪运动。清末立宪,既无宪法亦无宪政,所以立宪首先就是制定宪法。而今我们的改革,主要不是立宪法,而是让宪法中的具体法条(如第二章中的那些宪法保障条款)有效地束住权力,使其规范运作。故当今改革,虽头绪万端,但宪政第一。

在宪法和宪政之间,有着太大一片空白地带。宪政的实践,几乎可以其间任何一个问题开始。不需要刻意找寻问题,但问题自会源源而来,关键在于

像拔钉子一样要抓住不放。比如几十年来的劳教制度业已成为这段时间舆论持续关注的热点,已经形成的共识便是劳教制度亟须改革,再也不能把拘押公民因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交给没有司法审判权的公安了。这是宪法第37条的规定,对照宪法,公安属于行政权力的范围,它的劳教权力直接侵害公民人身自由,既没有通过检察院,也未经过法院。因而这项权力本身就属于非法权力,它的每一次行使都是典型的违法。宪政即宪法政治,其意在于权力运作不得与宪法抵触。凡为抵触,必依宪而改。所以,从宪法到宪政,当下最好的一个便是依照宪法彻底取缔劳教。这是一项侵犯人权的恶政,有宪法则无它,有它则无宪法。

宪政就是拔钉子,那些违宪的钉子要一个一个拔,因而它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梁启超说英国宪政“由实际上而进”,然后“次第进步,继长增高”。中国宪政之道也是如此。设若权力真正有心于宪法的权威,那就让“由实际上而进”的宪政逐步激活宪法,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摘自《中国经营报》12.15 邵建/文)

近日参加一场文化会议,一位后现代扮相的古典艺术家上台领奖,握住为他授奖的市领导的胖手紧紧摇了三摇,高喊道:“我代表所有的文艺工作者感谢您的关心和支持!”我忍俊不禁,笑出声来。左侧的Y兄问我何故,我想了想,只好答:想起了于丹。

上月,北大百年讲堂举办了一场昆曲表演,演毕,主持人请于丹上台致辞,不曾想遭到观众激烈抗议,于丹匆匆转身下台。被轰的原因之一,是于丹要代表全体观众向演员鞠躬致敬,台下有人喊“你没资格代表我们”。

我不认为,于丹真想代表台下的观众——以她的经济头脑,代表这些“鸟合之众”,还不如代表孔子划算呢——就像那位获奖的古典艺术家真想代表我们这些不名一文的与会者一样。这非常可能是他们的一种语言与思维习惯,一旦伫立于台上,哪怕台下人寥寥甚至空无一人,他们仍要“代表”一番。这样的“代表”,泛滥于我们的生活,同时主宰了我们的话语和思想。这一面,是“代表”的滥用;那一面,被代表者无知无觉,任由权利被侵占,身份被掠夺。两者合谋,在自欺与欺人的恶性循环之中,代表话语终于沦为了这个时代最虚声势、臭名昭著的谎言。对那些动辄就要代表台下的民众或一个群体的人而言,这简直是一种病,曰“代表症”。

其病因,不难明察。究其本质,则指向我们的政治传统。西人云:无代表,不纳税——此前还有一句:无授权,不代表。在君权神授、皇权天授的古中国,向执政者纳税,好似交地租、房租,可谓一种政治授名状,与代表毫无关系。由此决定了我们的某些代表话语,完全迥异于“无授权,不代表”之代表话语。换言之,我们沿用至今的代表话语,许多时候都只是一种话语暴力,一种虚有其表的官话。它的内涵早被掏空了,犹如一层苍白的猪油,浮于残羹冷炙之上,谁有话语权、话事权,谁即可予取予求。

语言与思想领域的“代表症”的改造,有赖于代表与被代表们的共同努力。尤其对知识分子而言,若无授权,请慎言——最好不要说——“代表”。哪怕你是文化明星,哪怕你的书销量百万,哪怕你荣获一等奖,你在台上,只能代表你一人。

(摘自《华商报》12.15 羽戈/文)

## 新锐短评

### 封锁消息只会助长“看客”心态

12月14日发生了相似的两起针对儿童的校园袭击案件。一是美国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造成28人死亡。对此,国内媒体的报道连篇累牍。而这一天早些时候,中国河南,据说有精神病的一男子在光山县文殊乡陈棚村完全小学砍伤22名小学生,但大部分媒体对此都表述有限。相似的受害者,媒体的反应如此迥异,让人不禁感到有些荒谬。对于大洋彼岸的悲剧,出于人道主义,我们应该适当地抱以同情和进行反思,但我们唯有学会对自己的苦难流泪和反思时,那些为他国人民贡献的泪水和谎言才会是真正有价值的,封锁消息只会助长“看客”心态。

(摘自《齐鲁晚报》12.17 王昱/文)

### 店大欺法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涉嫌价格欺诈正在整改的家乐福,任意改换熟食的生产日期。家乐福太原长风店值班负责人的态度是:店大不怕罚。家乐福出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而其工作人员牛气冲天口出狂言,也并非是第一次。某些大企业从“店大欺客”发展到“店大欺法”,不仅不把消费者当回事,连罚款和法律法规都不放在眼里,我们是否该对政府部门的监管力度和执法水平进行反思呢?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死不悔改者罚它个倾家荡产,估计再大的企业、再牛的商家也不敢胡乱撒野。

(摘自《都市女报》12.17 乔志峰/文)

### 生活依旧好 几度“末日”红

并非玛雅人才有末日预言,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世界各大文明、宗教几乎都有“末日预言”,这种危机感或许也是推动人类取得巨大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回过头来看,那些因“世界末日”而惶惶然者,不少是觉得自己没有好好珍惜时间和生命的人。然而,如果你笃信“世界末日”终将到来,谁也跑不掉,何必惶惶然,何不珍惜当下时光呢?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世界末日”,也不管“世界末日”是否即将或终将到来,“世界末日”给了人类一个回望过去、思考当下和展望未来的契机;人的生命都是短暂和宝贵的,过好每一天就是对生命和时间的最好诠释。

(摘自《长江商报》12.12 张建/文)

## 正常社会需要多少种歌声

看一个社会是否正常,看一个时代是否正常,看一个国家和国民是否正常,判定的标准之一就是唱和听的歌声在种类上是多是少。这里说的“正常”,首先不是指“非常”(包括非常美好或非常糟糕)。这里说的“种类”,也不是指一般性的数量,而是指类别。即使社会上有一万首歌,唱的都是一个歌词或一种曲调,也等于是另一种哑口。

我们既需要有人指挥、曲调一致的群体合唱,又需要许许多多的个人独唱,这样的社会才是丰满的社会。

当前中国的歌声已进入数量化时代,时时唱、处处唱、人人唱的现象已经普遍。而且把唱歌不仅当成一种兴趣,也当成一种重要的才艺标志。这当然是好事,比起当年(特别是“文革”年代)全国只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几首歌,今天不知要好上多少倍。但是细听起来,最流行的歌声无非有三类:一是对首长及其业绩的颂扬;二是对男女之爱的陶醉;三

(摘自《文学自由谈》2012年第3期 毛志成/文)

## 炫富是第八宗罪



艇也只在外国水域里使用。

挪威人仇富吗?其实不是,挪威人很富,其首都奥斯陆2012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74057美元,是全球排名第二的城市。可以说家家过得从容,无忧无虑,实在没有仇富的道理。洛克之所以惹了众怒,并不是钱多钱少的事,而是洛克四处招摇、故意炫富的暴发户做派,违背了挪威人谦逊处世的道德观,侵犯了他们维护社会和谐的防线。

欧洲人从中世纪就认为人类有七宗原罪: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暴食及色欲。虽然这七宗罪不同于杀人放火绑架抢劫等刑事罪,但是它们被视为所有罪恶的起点,情杀源于色欲,偷盗源于贪婪,暴力源于暴怒……奥斯陆大学社会人类学家阿奇蒂说,挪威人很重视意识形态,强调平等,敌视特权。因此,至少在挪威人的意识里,炫富是在现代社会中日显威胁的第八宗原罪。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44期 余泽民/文)

◀ 15 ▶ 责编/刘文  
美编/胡晴 照排/姚慧 校对/钟智勇

02

# “九亿人民不会答应”的一张接吻照

1979年,一张接吻剧照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问英杰的来信是篇坦白至极的奇文,批评他的来信也丝毫不客气地还击。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思想大解放的最真实的体现。

新疆一名干部来信:你们在干什么?

《大众电影》在1979年第五期杂志的封底刊发了英国爱情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剧照,画面中是王子和灰姑娘的接吻动作。电影是一个十分老套的主题,王子与女仆经历了痛苦、磨难、思念和抗争,终于达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圆满结局,含有反封建的进步色彩。《大众电影》编辑部精心挑选了这幅接吻的剧照予以刊登,认为最能表现爱情。然而,这一张照片引起了新疆奎屯农垦局一二九团政治处问英杰的反感和愤怒。在他还没有看过电影的情况下,以“九亿人民的代表”自居,向《大众电影》发了一封措辞直白但却异常尖锐的质问信——《你们在干什么??》

《大众电影》编辑部总编、编辑同志:

我看了你们编辑出版的一九七九第五期的封底影照,非常愤慨!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

毛主席生前多次教导我们:“洋为中用”。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你们显赫地刊登这幅影照,是什么动机?是在宣扬什么呢?难道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任务、党的政治路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你们这样宣传吗?难道九亿人民大众在长征途中需要你们给予这样的鼓舞吗?……你们准备把我国的青少年指引何方呢?你们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吗?还有点中华民族的气概吗?同志们!不要以为洋大人放个屁都是香的!

总编、编辑同志!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你们都是有知识的人,有学问的人,应该好好想一想,千等于是另一种哑口。

当前中国的歌声,可喜之处在于多元化,可忧之处在于多序化,因为极端的多序就等于无序。什么是无序?不只是混乱,而且必然包括淳化、伪化、恶化。就以当前最盈耳、最活跃的艺坛(首先是歌坛)而论,固然有“正声”、“清声”但“邪声”、“杂声”、“秽声”似也不乏。有的“艺术”,在本质上无非是胡闹而已。

莫小看歌声的能量。官声、民声、乡声、市声……,加在一起就叫国声。国声正、国声清、国声淳,乃是真正的文化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

总编、编辑同志!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你们都是有知识的人,有学问的人,应该好好想一想,千

万不要随波逐流,借“百花齐放”之名,行放毒害人之实。那样,九亿人民不会答应的!不管谁支持你们的这种罪行,我敢肯定,他总有一天会受到九亿人民的谴责或审判的。……

我在愤恨之下,一气写了此信。出言不逊,对你们一定会有一点刺激,也可能你们会觉得好笑,或是咒骂什么“极左思潮”、“四人帮那一套”等等。反正现在帽子工厂,帽子店尚未彻底关闭,我从来也不害怕什么帽子、棍子,敢做敢为,对了坚持,错了就改。你们如有胆量,请在《大众电影》读者来信栏,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让全国九亿人民鉴别一下,那才是“百花齐放”,有点“民主”的气氛。否则,我只能认为你们做贼心虚。欠人民的账是一定要还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报,时候未到!

致以 敬礼

新疆奎屯农垦局一二九团政治处 中国共产党员 问英杰 (略有删节)

读者愤怒回信:他能代表九亿人民吗?

问英杰“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让全国九亿人民鉴别一下”的挑衅得到了回应,《大众电影》请示上级后,决定公开发表。问英杰的来信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回响。从城市到农村,从内地到边疆,读者的来信和来稿雪片似的飞到了《大众电影》的编辑部。自8月28日至10月15日,共收到来信11200余件。这在当时,可称得上全国瞩目的大事。然而,事情的具体情况在传播过程中却受到了歪曲。2009年曾有一个知名电视台节目回顾建国60年历史时提到该事件时称“一万多封来信支持问英杰的看法”,而另一份知名报纸在回顾该事件时则称“支持问英杰的来信不到三分之二”。事实是这样的吗?

事实是,这两种说法都是完全错误的。读者来信的真实的情况是:赞同问英杰看法的来信还不到“百分之三”,其余的都是反对问英杰看法的。思想压抑、话语压抑、性压抑了十多年的中国人民,面对以问英杰为代表的“极左回潮”,再也不愿意沉默,纷纷写信道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以下是以来信选登:

《他能代表九亿人民吗?》

这是四川乐至县陈尚勋等六位普通工人的来信标题。他们自认文化水平不高,说不出深奥的大道理,但他们的质疑却非常一针见血:

“最可笑的是这位堂堂党员还要把他的那个极为错误的观点强加到九亿中国人民头上。而他竟能‘代表’九亿中国人民来凶神恶煞般咒骂我们党目前的文艺方针。这可是不能容忍的!这可是强奸民意吗?”

《搞蒙昧主义是不行的》

来自广西北海的读者克彦则具体指出了问英杰逻辑的荒谬虚伪之处:

“难怪‘四人帮’时期,‘革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而文艺对爱情的内容,则是绝对禁绝的……(以为)一禁就绝,我们的青少年一代,自然就可保平安的了。可惜得很,在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正是在‘四人帮’‘革命’最盛、禁绝最严的时期里,社会上出现的阿飞、流氓最多。”

接下来,他又以《上甘岭》为例,批驳了“难道九亿人民大众在长征途中需要你们给予这样的鼓舞吗”的说法:“《上甘岭》影片,是十足的战斗吧,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在战斗的空隙时刻,按照‘帮艺术’的逻辑,自然是战士站起来,一手握枪,一手握着空气,高呼‘同志们,消灭美帝国主义,冲啊……’可是影片的编导,却偏偏要让我们的战士唱歌,而且歌词居然是‘姑娘好像花一样,……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在观看影片时,有多少人要为我们战士的战斗力担心。上甘岭的战斗胜利了,可见姑娘对于战士也不见得可怕。一张美好、健康的《水晶鞋与玫瑰花》剧照,却又何必大惊小怪呢?继续搞蒙昧主义是不行的。”

民心向背的测验结果,让问英杰很气愤,他甚至扬言要持刀杀害《大众电影》的两位编辑。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几年之后,问英杰本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由一个厌恶跳舞变成了爱跳舞,每星期至少要跳两三场,并且没有固定的舞伴。“有一年,我和他一起去云南参加全国农垦摄影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一到昆明,他就邀我当晚跳舞。在舞场,他‘厚着脸皮’,邀请那些素不相识的南方小姐,几乎没有空一场。”一位熟悉问英杰的人如此回忆道。

(摘自《南方都市报》钟刚/文)

## 法拉奇眼中的历史细节

知名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采访是“习惯于用录音机录下访问中的全部问答,然后一字不漏地以原对话形式全文加以发表,但加上一个占一定篇幅的前言”。一字不漏地将原对话全文发表固然非常真实,但《前言》部分中对采访对象的刻画,也十分有趣。

先是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当法拉奇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日上午如约走进基辛格在白宫的办公室后,“进去以后他竟忘了我的存在,背着我,开始阅读起一份打字稿。我站在房间中央感到有点尴尬,而他始终背着我念他的打字稿。他这样做既愚蠢又不礼貌。但是这种局面倒使我有机会在他研究我以前先把他研究一番。我还发现他毫无诱人之处:粗壮的矮个子,顶着一个瓶状的大脑袋。我还发现他并不从容自如,并不那么自信。在跟对手打交道之前,他需要一些时间做临场准备,需要凭借他的权势来壮胆子,其结果是表现得极不礼貌。”(《亨利·基辛格》)

请再看看她笔下的约旦国王侯赛因。“国王坐在他那王宫办公室的安乐椅上,安乐椅很大,这使他只有一米五九的身材显得更矮小。要使他靠椅背上的,他的脚只能刚触及地毯。但是他依然靠着椅背,双臂架着扶手,从容地交叉着两手。这表明,身材矮小并没有使他表现怯弱,相反,健壮的体魄使他显得威严。”(《约旦的侯赛因》)

当然,她的采访记录中由被采访者透露出的一些历史细节,也令人吃惊不小。比如她采访意大利的终身参议员皮埃特罗·南尼时,南尼这样说道:“有一次赫鲁晓夫对我说,斯大林对俄国了解甚微。他看到我十分惊讶就解释说:‘我们为他制作电影,然后放映给他看。那些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场面都是编造出来的。’”(《皮埃特罗·南尼》)(摘自《书屋》第11期 郁土/文)

## 我经历的旱灾

我小时候家里出身不好,西北又常干旱,吃不饱是常事。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0岁左右时的一次旱灾。

我们全村的大人们都很紧张。

大队刚在山头上装了一部新的广播,不停地在广播里传达各级领导的指示,有公社领导的,有县领导的。学校也停课了,我们小学生年龄大一点的用水桶,小一点的,像我们二三年级提不动水桶的就用瓦罐,从河里提水给地里的玉米浇水。

那时我的年纪很小,还没有大人们的那种恐惧和紧张。

接下来河里的水也干枯了,有些水井也没有水了,吃水要到很远的水井里去挑。

有一天,我看到几位老人悄悄地进入我们学校旁边的寺院里,跪在菩萨面前祈求上天能给快干死的庄稼下一点雨,救救村里人的命。在平时总有武装起来的基干民兵来

阻止这些封建迷信活动,那天我没有看到这些民兵。

这几位老人走后,我在菩萨面前发现了一个大草果,我拿走吃了,并把这事告诉了同班的另外一个同学。从那以后我们俩经常结伴守在菩萨面前,希望能再碰上菩萨给的好吃的东西。

但再也没有了,就遇上这一次。

把妹妹送人

没多久,我们家没有吃的了,我的爸爸妈妈是十分坚强的人,一定要